

东方早报

上海
书评

上海书评选萃

都是爱书的人

SHANGHAI REVIEW OF BOOKS

沈昌文等 著

等
著

沈昌文

都是爱书的人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是爱书的人 / 沈昌文等著；华慧编；李媛绘.
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3.7
(上海书评选萃)
ISBN 978-7-5447-3915-3

I. ①都… II. ①沈… ②华… ③李… III. ①书评—
中国—现代—选集 IV. ①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0416号

书 名	都是爱书的人
作 者	沈昌文等
编 者	华 慧
绘 图	李 媛
责任编辑	周 璇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6.375
插 页	4
版 次	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3915-3
定 价	35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：02583658316)

目 录

- 001 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
- 015 钱伯城谈八十年代的出版热
- 026 林行止谈《信报》三十五年
- 036 陈昕谈图书市场与书价高低
- 052 黄育海谈民营出版
- 063 郝明义谈数字化时代的阅读
- 074 刘苏里谈书店的未来
- 085 企鹅老总马金森谈出版业向何处去
- 097 罗伯特·西尔弗斯谈《纽约书评》
- 113 戈特利布谈编辑艺术

124	我的“《读书》十年”	/ 吴彬
138	她的周围，都是爱书的人	/ 高林
148	DK，死在“营销王”手上	/ 俞晓群
159	得了编辑病的那个家伙！	/ 傅月庵
165	“不能畅销，何必出书”	/ 刘柠
174	畅销书的秘密	/ 陈一白
187	阅读的春天在哪里	/ 陈昕
194	编选说明	

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



丨 沈昌文

2010年9月14日，著名出版家、三联书店原总经理、《读书》创始人范用先生逝世。而在之前的2004年，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、《读书》首任主编陈原先生作古。老一辈的出版人虽逐渐凋零，但是他们的风范依然值得后来的从业者记取。作为范用先生的继任者，沈昌文先生曾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、《读书》主编多年，与范用、陈原等前辈都有密切的来往，他对这些往事的追忆，或多或少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出版业的艰难历程。

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范用先生是哪一年，在什么场合？当时他给您的印象如何？

沈昌文：我1951年3月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人民出版社，大概在4月份就见到了范公。因为我在他的部门工作，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期刊出版部的校对科做校对员。范公是期刊出版部主任，他是我的领导的领导。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1年4月初，在人民出版社所在的东总布胡同。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威严的领导同志。

您眼中的范用先生是一个怎样的出版家？

沈昌文：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书籍尽心尽力，付出了很大的力量。我现在还是这个看法，没有改变。

现在我们知道,《读书》杂志是由范用、陈原、陈翰伯等老同志联合创办的,当年他们之间是如何配合工作的?

沈昌文:创办《读书》时,我没有参与。一年后,我才进编辑部。进去后我发现,范公虽在名义上不是最主要的,实际上他出力极多。这是他多年做事的特色,就是不愿出名,而是幕后组织和操控。例如创刊号李洪林的文章,标题“读书无禁区”是编辑部改的。我后来对媒体说是史枚先生改的。我有根据。因为我手里有当年留下的手稿,上面是史枚的笔迹。但后来范公对传媒说是他改的。我起初以为他弄错了,后来一想他是对的。他办事的特点就是幕后操纵。他一定对史说标题要改,史就改了。

但是,两位陈老那时也是对《读书》尽心竭力的。他们管大局。我手里有陈翰伯在创刊期间的批示,已在我的书里发表过了,大家看,老人家对这刊物多尽心。更不要说在创刊两周年时他主动亲自写的那篇《两周年告读者》了。陈原老人家单给我写的有关信件就有几十封。总之,要是把当年三位的合作比喻为一个公司的话,陈翰伯是董事长兼总经理,陈原是总工程师,范用是办公厅主任。

范用先生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时候,三联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牌。据说三联能独立,他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但到

1986年，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后，第一任总经理却是您，而不是范用先生。

沈昌文：这我也很奇怪。我那时位卑职低，上层的事说不清。三联独立确实是范公大力办成的。他是独立的筹备小组组长。但到正式独立，1985年底，上面宣布他离休。可实际上他那时六十三岁，还不到六十五岁。也许那时政策规定六十岁以上不能新任命为领导。

不过那时下面也有一个传闻，说范公有一次去上面开会，居然同一位高层领导顶撞了起来，他公然说对方的水平只能搞总务工作，管不了文墨之事。这传闻自然不可信。至于提名我当总经理，范公对我说过，是他和倪子明同志一起提的。那是他多年后为了某事写信痛骂我时提到的，认为他后悔那时的提名。

您曾经说过，您一辈子受到范用先生的关照和提携，能具体说说吗？

沈昌文：在这里举一些印象深刻的例子。第一件是1951年我做校对员之后不久，犯了一个大错误。当时正在抗美援朝，我校对的《新华月报》校样中把“抗美援朝”排成了“援美抗朝”，我没有校出来。当时我还是初校。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，他教育了我但并没有处分我，这是对我的关照。这

是我参加革命出版工作之后犯的第一个错误。

第二个错误,1957年反右的时候,该年的上半年,人民出版社也因为内部的一些问题,群众意见纷纷。当时我也是群众,尽管我还没入党,但已经被提拔为社长秘书。我出于正义感,觉得应该对党内的问题发言,结果发表了一点意见,也在别人的有鼓动性的大字报上签了名。我对几位当年很积极的先生比较钦佩,其中一位是戴文葆。某天晚上,范公和我谈话,他告诉我第二天要开始反右,戴文葆要被点名批判,我应该及早表明态度。听了之后我知道情况有变化了,当天晚上就写了大字报和戴文葆划清界限,第二天早晨贴出来。那时范公是反右办公室主任,他把这个信息告诉我,让我首先揭发了戴。所以之后在讨论我的问题的时候,大家觉得沈昌文虽然有重大错误,但是在戴文葆的问题是立了大功的,因此我的错误可以不划成右派。所以1957年组织上给我的结论是“中右”,不是“右派”,避免了以后去劳动改造。这两件事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。

1953年底1954年初的时候,我离开了他的部门,做了总编辑的秘书。这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翻译了一些俄文的资料。那时年轻人中懂俄文并且能够翻译资料的并不多。我从他的部门调出来,当然他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,但具体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。我在之后被评为“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

子”，大概他在其中出了不少力，但我本人并不太了解。

在办《读书》杂志之前，因为种种原因我正在考虑离开人民出版社，去商务印书馆。当时我是跟陈原提的。但是后来范公找到我说：“你不要去了，我和陈原商量了，你留下来成立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，你来主持，并且负责《读书》杂志。”当时他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太清楚。

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。后来可能他觉得我不成材，否认有这事。但是我记得很真切。我1960年入党，当时在党支部讨论时遭到很大的反对。我被认为走白专道路，在阶级斗争中表现不佳，可是他尤其是还有一位社领导王子野都很支持我，做我的入党介绍人，这我非常感谢。

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范用先生跟您交恶，甚至绝交。您能谈谈是什么原因吗？

沈昌文：这个原因很复杂了。我想有三个原因。他尽管已经在1985年底离休了，由我来主持独立后三联的工作，但是他还是经常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、出主意、想办法。其中有很多意见很好，我也都执行了，可是有三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做到，这可能引起了他很反感。第一个是他提出来要做的我不敢做。原因很简单，我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宣传方针、整个的大方

向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他不主张对作家的稿件进行删改，但我很喜欢删改，对这点他很反感。但当时我还不是主要的负责人，不便发表过多的意见。等到我成为主要负责人之后，我并没有按照他的方法进行，让他很反感。这个是不敢按照他的办法做的。

第二个是我不善于按照他的路子走，特别是关于艺术、关于美、关于封面。他懂得书、懂得艺术，特别是关于书的装帧，在这方面不断地发表意见，而且一定要照改。到我主持工作之后，在这件事上经常阻止他，而他则认为我不懂美、不懂艺术。我的基本立场是站在美术家这一边，觉得他们怎么设计就怎么做；他喜欢干预，而且讲的话是比较凶的，如说“你不懂”、“你们怎么这么庸俗”等等。这个我也跟不上。我到现在对书的装帧，最能接受的是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组织出版的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。这样的水平，他当然绝对受不了。

第三个是我完全不想按照他的路子走。他在离休后还是经常跟作家约稿，而且把稿费等问题都谈定了，价钱都比较高。这个事情我讲实话是比较反感的。因此他代表三联书店约的稿件我退了一些。三联书店初创时期，经济非常困难。他的特点是完全不管经济。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家的时候，他只要了三十万块钱、一百来部稿子，以三联名义出版的翻译稿他

一部都不要。其实已经出版的书都已有纸型，重印不需要多少本钱，而且当时翻译书的原著是不付版税的。但是他完全不管这些。他的理由也很难驳倒，就是说邹韬奋先生当年就是艰苦奋斗，你们要学习他。我主持工作时，没钱、没房子，经济非常困难。说实话，是靠别的三联书店的老前辈帮我借到钱的，那些老前辈有的是反对他的，跟他有矛盾，现在来支持我们。所以我的三个“不”——不敢、不会、不想——是和他有很大矛盾的，以至于他认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够格的搞出版的人，所以和我绝交。后来有大量的言论骂我不成材，他也给我写信当面骂我，在信中也直说要把信抄送给党支部。

我也有受范公启发完成了他的理想，但是改变了他的方法。举个例子，他那时候很想恢复《生活》杂志，亲自编了《生活》杂志的试刊，打了报告要求出版。但是最后没有被批准，因为他要办的刊物的言论太激进。等到我临退休以前想起这件事，觉得还是一件好事，又打了报告，最后办了《三联生活周刊》（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“生活”两个字已经被哈尔滨的某个杂志用去了）。这本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一直办到了今天，我很高兴。这个启发应该是从范公那里来的，可是必须改变范公的思路。他听了这话也许会生气。其实现在的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确实是从他那个路子来的，但是加以改变，适合需要。他是老前辈了，

以往我向他汇报工作都很难，比如我告诉他：“这样不行啊，上面不赞成。”他就会说：“上面的谁啊？你让他来找我。我出版的时候他在哪里？！”

再举一个小例子。《读书》办了一些时候，他和一些老革命提倡要搞读书会。这自然是好事。他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在人民出版社就搞过读书会。我是那时在那些读书会上才知道《围城》的，借来读了大感兴趣。但是，我们搞了一阵读书会后，我发觉有些大学的党团组织对这种活动很警惕。那时，从电视上看到牡丹电视搞顾客服务活动，我受到了启发。我灵机一动，把我们的活动更名为“读书服务日”，对上面报告说我们搞的是产销合一，于是皆大欢喜。范公觉得他提出的活动在不断举办，也高兴。

当然，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不多，大多数都是让他烦心的。

不久前，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先生发表了回忆范公的文章，其中提到范公的个性，我觉得可以帮助大家理解，文章中说：

他性格刚强、决断明快、爱憎分明、嫉恶如仇，却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。他认定要做的事，往往坚决果敢，全力以赴，一竿子插到底，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。他办事能力较强，工作效率高。但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，我发现他身上总脱不掉过去形成的某些习性，如我行我素，家长式的领导作风，喜欢独断独行，不习惯集体领导等等，常被

人认为不太好和他合作共事。他还有一种“傲上”性格，对有些他看不惯的领导人他会躲开，不理他们，他很不喜欢官场那一套，发展到不愿和上级机关打交道。

其实他个性耿直，待人真诚，酷爱出书、编杂志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几十年如一日。我和他多年来一直相处很好，因为了解他，知道他的性格，也敬重他对事业的执著和认真，所以在工作上我尽力支持他配合他，让他有充分的自主权，如别人的书稿选题要集体论证通过，他策划的选题书稿则由他一人拍板决定，我们都不去干预。

您也曾说过，您对范公，是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难道就因为他对您有恩，您就没想过要向他消除误解吗？

沈昌文：我没有想到要和他消除误解。向他解释过若干次，没效果，之后他还不断地给我写信来骂我。于是我想以后就没有必要再去解释了，我还是想办法销声匿迹吧。我在他面前躲开，甚至想离开三联书店。为此，在1991年1月20日，我专门写信给三联书店前辈徐雪寒同志。我说：“五六年以前，我曾满怀热情，参与筹建‘三联’。以后承揽全局工作，诚惶诚恐，力求实现理想。然而几年下来，我已完全幻灭，承认恢复‘三联’之

举必不能在我手上完成。这中间，客观困难自不论。在主观上说，则无论老中青三者，均无法达致共识，是一重要原因。我是‘中’一辈，自应斡旋其间，促进调和谅解。然而因我本身姿态不高，亦因某些老同志要求过苛（恕我直说），使得裂痕越来越大。某些三联前辈对‘三联’出书和经营之指责，我已屡闻。这些看法，确实有理，切中肯綮。然而，在现在的情况下，大多做法是由于现实的需要而不得不尔。”“我自去年已还，憬然有悟，悉知底事之不可为，因已向新闻出版署坚决请辞。我在书面辞呈里明确提出，我的工作之最重要败笔，即为处理不好与‘三联’前辈的关系，而这对‘三联’这类老店来说，却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
现在范用先生已去世，如果您还可以解释，您会说什么呢？

沈昌文：现在也不必解释了。本就没有公开的言论，但在给朋友的信中写了很多，我也不再解释。

您曾跟随陈翰伯、陈原、范公等老一辈出版家多年，他们的工作方式各异，或者异中也有同，您能介绍一下吗？

沈昌文：我跟陈原的关系特别熟，跟范公的矛盾可能一部分也在这儿。

他俩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住在楼上楼下的。他们两位领导

之间可能有些隔阂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可是我一直跟着陈原，跟得很紧，一直到他去世。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得一直很愉快。我有兴趣的正是陈原的专长，他是外语专家，我特别喜欢外语。我在“三联”主持工作的时候，也是因为范公的关系，我著作稿很少管，主要负责翻译的书。比如范公和巴老关系挺好，要出巴老的书，我就只管出巴老翻译的书，巴老的著作我一点不插手，巴老翻译的书我出了很多。这个都跟陈原有很大的关系。在回忆录里我也提过，我们在一起经常讲三种语言：俄语、德语、世界语，他很喜欢用这三种语言，我也勉强会一些。

应该说陈翰伯、陈原、范公在出版路线上的主张是一致的，都是改革派。可是范公是主张顶着干，我没这个能力。陈原主张利用外国书来讲中国的事情，这个我配合得比较好，也很乐意做，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效果。比如从巴金那里发现了房龙的著作《宽容》，第一版就印了十五万册，影响挺大。还有像《情爱论》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，我本身比较内行。这和陈翰伯有密切的关系，他主张改革开放，他告诉我的办法就是从马恩和毛主席著作中去找题材。陈翰伯过去是《新华日报》的人，所以他非常了解毛主席对自由民主的发挥。我跟随他读了很多马列著作，也知道了马恩比如说在爱情问题上的观点，这些都促使我组织翻译了《情爱论》，一下子印了一百二十万册，取得了很